

# 1921-1925年中国共产党对 凯末尔革命的观察与反应

黄志高

(安徽大学 政治学系 安徽合肥 230039)

〔摘要〕 中国与土耳其的同病相怜,以及凯末尔在苏俄援助下的成功,促使中共高度关注凯末尔革命。但中共对凯末尔革命的评说,又反映了苏俄在中国寻求盟友,与孙中山合作的战略意图。这就决定了中共的论说是有选择性的,对凯末尔的转向和反共,有意无意地进行了某种程度的遮蔽。对凯末尔革命的观察和反应,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共产国际、苏俄与中国革命的复杂关系。

〔关键词〕 凯末尔革命;共产国际;苏俄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689(2010)02-0119-05

1920年土耳其爆发凯末尔(又译为基马尔)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当时土耳其与中国有着极其相似的境况,都被视为“亚洲病夫”。凯末尔革命得到了苏俄的大力援助,终于取得民族解放的重大胜利。土耳其的成功给正在为民族独立、自由而苦苦奋斗的中国人以很大鼓舞。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更是密切关注凯末尔革命,作了很多报道和评论。中共对凯末尔革命的观察和反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共产国际、苏俄与中国革命的复杂关系。

## 一、中共与苏俄关注土耳其革命的缘由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苏丹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色佛尔条约。土耳其商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穆斯塔法·凯末尔领导土耳其人民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但遭到土耳其苏丹政府和西方列强的武装干涉,面临失败的危险。1920年4月26日,处于困境的凯末尔致信列宁,建议建立外交关系,并请求在土耳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给予援助。土耳其人民的斗争得到了苏维埃俄国的支持。1921年3月16日,苏俄与土耳其签订《友好亲善条约》,并给予土耳其大量物资援助,提供了几万支步枪、大量的火炮、机枪和一千多万金币。<sup>[1](414)</sup>1922年8月,土耳其军队彻底击败在英国支持下

的希腊军队,11月又废除苏丹制度。在1922年11月到1923年4月召开的洛桑会议上,色佛尔条约被废除,取消了外国人的特权和领事裁判权。

1921年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凯末尔革命给予了相当关注。其一,中国与土耳其同处亚洲,当时境况相似,都被视为“病夫”,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正如蔡和森所说,“最近一世纪来,世界上最被国际帝国主义压迫的老大国家莫如土耳其与中国。土耳其与中国的问题,就是所谓近东问题与远东问题。这两个地方,一面成为贪暴无厌的国际帝国主义战争攫夺的中心,一面成为占人类三分之一以上的被压迫民族最痛苦罪被宰割的区域。”<sup>[2](113)</sup>同病相怜之感,促使中国人极其关注土耳其的命运,关注土耳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走向。

其二,援助土耳其、中国等东方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是苏俄东方战略的重要内容。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受到西方国家的敌视、封锁和包围,处于相当困难境地。苏俄致力于在东方国家推动民族解放运动,以打击国际帝国主义,并缓解苏俄面临的压力。1913年,列宁就注意到,继俄国1905年的运动之后,民主革命席卷了整个亚洲——席卷了土耳其、波斯、中国。列宁指出,中国、波斯、土耳其等半殖民地国家和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有的刚刚开始,有的远未完成。社会党人不但应当要求无条件地、无代价地立即解放殖民地,还应当最

〔收稿时间〕 2010-05-08

〔作者简介〕 黄志高(1977-),男,安徽怀宁人,安徽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法学博士。

坚决抵制支持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最革命分子,帮助他们的起义,反对压迫他们的帝国主义列强。<sup>[3](569)</sup>他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必须同东方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会合起来。没有各被压迫殖民地民族劳动群众的援助,首先是东方各民族劳动群众的援助,无产阶级革命是不会取得成功的。民族危机严重的土耳其和中国正处于苏俄东方战略实施的重要地域。苏俄希望以土耳其革命的成功为示范,推动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共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的,苏俄的战略意图通过共产国际落实到中共的言行中。

## 二、评介凯末尔革命的深层意味： 推动联合苏俄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二大明确提出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改变了党的一大关于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的规定,提出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中共二大还宣布加入第三国际,这又给中共带来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根据二大的精神,面向孙中山,积极推动孙中山改弦更张与苏俄合作。这种努力充分体现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对凯末尔革命的报道和评论中。

1922年9月,蔡和森在《向导》上发表文章,批评孙中山对西方列强抱有幻想。蔡和森指出,国民党的外交方针,有从新估定之必要。中国要实现民族独立自强,必须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之好友苏维埃俄罗斯,努力完成民主革命,推翻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特权与压迫,建立完全自主的独立国家。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要取得成功,“便要一面与民众为亲切地结合,一面与苏俄为不二的同盟”,希望国民党“勿以民众力弱而与之疏隔,勿以善邻式微而不与之接近,勿因一时之利害,而忘远大,勿让土耳其基马尔氏所领袖的国民党专美于前!”<sup>[2](100)</sup>

9月27日,《向导》又刊登蔡和森的《祝土耳其国民党的胜利》一文,热烈祝贺土耳其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统一、独立与自由。蔡和森着重分析了凯末尔革命成功的深层原因,指出,“基马尔国民党当着土耳其这样颓废,崩坏,被宰割的残局”,“而能战胜国际帝国主义”,关键在于“改变自来各派政党依狼拒虎或倚虎拒狼的亲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而毅然决然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之好友——苏维埃俄罗斯联合”。凯末尔革命的胜利,“给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以最

好的模范和印象”,“被压迫民族的解放,现在已经发现了一条胜利的大路,就是被压迫民族与苏维埃俄罗斯的联合”。“伟大而有胆识的基马尔将军,既领导土耳其民族跑到这条伟大胜利的路上来了,……近东被压迫民族已由黑暗而渐趋光明了,然则远东被压迫的民族应当作何感想呢?尤其是三十年来,孤军奋斗,异常被国际帝国主义所嫉视所压迫,并且与土耳其国民党出同一地位的中国国民党应当作何感想呢?”文章号召“快快起来促起我们革命的政党统率我们与苏维埃俄罗斯联合,以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压迫呀!!!”<sup>[2](116)</sup>显然,中共是以凯末尔的成功为范例,推动孙中山与苏俄的合作。

内外交困的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推动下,终于认识到“与苏俄建立一个更紧密的联系是绝对必要的”<sup>[4](278)</sup>。但是,让俄国人不满意的是,孙中山虽然向苏俄伸出橄榄枝,表达了合作意愿,却又对西方国家心存幻想,梦想取得“友邦”援助。孙中山尤其担心,一旦与苏俄结成同盟,会给西方国家以借口进而干涉中国革命。这些都影响到孙中山联俄的步伐。1923年5月2日,蔡和森对此提出批评:“因为要避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嫌疑,因为要保持‘外交’的面孔,国民党不但不敢与民众接近,更是不敢与苏维埃俄罗斯接近,苏俄革命成功已六年了,土耳其国民党得其帮助(这才是被压迫民族真正的帮助)业已战胜外国帝国主义使土耳其民族朝向解放的路上走了,然而中国国民党至今还未派一个正式代表赴莫斯科呢!”<sup>[2](274)</sup>

联合苏俄以推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既是中国革命的必然选择,也是共产国际、苏俄政府的战略利益要求。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亲自捉刀,1922年11月2日,以“孙铎”之名在《向导》上发表《俄国革命五[周]年纪念》,指出,“当土耳其国民党基马尔重新恢复小亚细亚并接近鞑靼海峡,于是列强更知道一个新而强有力的俄国的存在怎样帮助被压迫的民族反抗世界帝国主义。他们知道得很清晰,土耳其国民党与俄国政府中间久已成立一种密切关系。当基马尔把希腊军队打败,他的胜利也就是俄国对于英国的胜利。”“土耳其的榜样实给我们不少的教训。”“国民党的领袖势必与唯一的反资本主义的强大的俄国成立一种亲善的关系,并须发达中国人民对于俄国的友谊与感情。在我们的意见,国民党的领袖,虽已是新俄国的好友,但还没有十分了解一种中俄亲善的宣传之必要。”<sup>[5](334-335)</sup>

《向导》的报道与评析还有一层用意,就是积极制造舆论,配合苏俄与当时北京政府的建交谈判。联合

孙中山主要是通过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马林等进行的,而建交谈判则主要是苏俄外交使团进行的。这两方面工作同时进行。实现中俄建交是当时苏俄为摆脱国际上孤立的困境所迫切需要的。为此,1920年8月远东共和国根据苏俄政府的指示派出优林率领的远东共和国驻北京使团,到北京与中国政府进行接触,但由于双方分歧较大,谈判未果。1921年12月,苏俄政府直接派出派克斯外交使团抵北京,与中国政府重开谈判,次年5月亦无功而返。1922年8月,又派出苏俄驻华特命全权代表越飞来华,双方仍未能达成妥协。1923年8月,苏联又派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出使中国。

对于苏俄的这一外交需要,中共也给予积极配合。1922年9月27日,蔡和森发表《中国国际地位与承认苏维埃俄罗斯》一文,指出,中国要提高国际地位,实现真正的独立与解放,非经过世界革命的潮流不能成功,非与业已在国际上占新的重要地位之苏维埃俄罗斯携手,不能为力。我们要了解苏维埃俄罗斯在国际上的新势力与新地位,看看土耳其国民党政府提议协约国须会同莫斯科政府才得谈判近东问题的事情,就明白了。文章指出,“我们现在主张觉悟的人民,应一律起来压迫那自来亲附国际帝国主义的北京政府,即日承认苏维埃俄罗斯,与长春会议同时开一中俄会议,以解决中俄一切问题。”<sup>[2](111)</sup>

苏俄希望与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期望终于获得成功。1924年,苏俄和北京政府签订《中俄协定》,从而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获得了最大邻国的承认,进一步打破了协约国的封锁。对中国而言,尽管该条约某些内容损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但毕竟废除了以往两国间的不平等条约,并获得了苏联对外蒙是中国之一部分的承认。陈独秀对这一条约作了充分肯定,指出,“土耳其这些独立不羁之位置,中国在中俄协定都得着,并且中俄协定明认中东路可由中国赎回及中国在蒙古之主权,而洛桑议约则土耳其不能收回莫亨尔油矿及许外国军舰自由通过海峡,两下对照起来,中俄协定更好过洛桑议约”<sup>[6]</sup>。

与此同时,孙中山与苏俄的合作关系也得以确立。1923年1月,孙中山和越飞签署“联合宣言”。9月,“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莫斯科。10月,孙中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并委托其参与国民党一大宣言和党章党纲等重要文件起草。孙中山肯定了苏俄对于东方落后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作用。他指出,土耳其在欧战之前,最贫最弱,不能振作,欧洲人都叫他做“近东病夫”,应该消灭。欧战后,各国试图将

其瓜分,土耳其几乎不能自存。“后来俄国出来打不平,助他赶走希腊,修改一切不平等条约。到了现在,土耳其虽然不能成为世界上的头等强国,但是已经成了欧洲的二三等国。这是靠什么力量呢?是全靠俄国人的帮助。”孙中山赞扬苏俄“抑强扶弱,压富济贫,是专为世界上伸张公道打不平的”。<sup>[7](192)</sup>

### 三、注视凯末尔政权的新动向： 从期望到失望

凯末尔革命积极寻求苏俄的支持,并如愿以偿,获得了大量的物资援助。但是,凯末尔政权毕竟是土耳其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对苏俄在土耳其影响的扩大、对土耳其共产党的发展,本能地抱有戒心。土耳其民族战争初期,凯末尔党人用以前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和泛伊斯兰主义者组成了御用的“共产党”,以此麻痹和争夺群众。1921年1月,穆斯塔法·苏布希等十余位共产党的领导人被杀。1922年秋天,在安戈拉召开的土耳其共产党代表大会被驱散,许多共产党人遭到迫害。御用的“共产党”也被解散。

更让苏俄意外的是,凯末尔政权在对外关系上既利用苏俄的影响以与西方列强讨价还价,同时又对西方列强作了妥协,并逐渐采取了疏俄政策。苏俄应邀参与了1922年召开的洛桑会议。苏俄非常关心会议所涉及的鞑靼尼尔海峡问题,列宁希望“不论平时和战时都不准任何军舰通过海峡”。<sup>[8](573)</sup>但这一主张没有得到满足。关于海峡问题,会议通过的是土耳其作了某些修正的英国的公约草案。各国的军舰获得了无阻碍地通过海峡的权力,只是对军舰的数量及其吨位作某些限制。苏联方面认为,洛桑会议规定的海峡制度是用来反对苏联利益的,因而没有批准洛桑公约。

中共最初对洛桑会议寄予厚望。《向导》周报刊登了蔡和森的系列文章对会议进行跟踪报道。会议前夕,1922年11月8日,蔡和森在《土耳其与国际帝国主义》一文中,详细分析了英法美等国的态度,介绍了土耳其向协约国提出的条件,尤其是土耳其在各方关注的海峡问题上的立场,强调只有苏俄始终友好帮助土耳其。12月6日,又发表《洛桑会议中土耳其民族唯一的帮助者》,再次强调“洛桑会议中土耳其民族唯一的帮助者只有社会主义的劳农俄国。劳农俄国是坚持赞助土耳其民族的独立与自由,强硬的主张完全恢复土耳其在海峡上之主权的。”<sup>[21](184-185)</sup>

洛桑会议上土耳其对西方列强的让步,让中共深感出乎意料。蔡和森在《洛桑会议与土耳其》一文中痛



切地指出,土耳其的胜利——由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群众英勇奋斗得来的胜利,现在在洛桑会议中完全丧失无余了!土耳其重新得了一副奴隶的枷锁和行将被迫而签字的投降条约。“基玛尔抛弃群众所要求之民族独立的军事行动,天天与帝国主义者作公开的或秘密的谈判,以为利用英法间的暗斗,可用亲法的外交手段达到他所代表的要求,并且为践法土间的秘密互诺,对于联立战线——土耳其国民党与共产党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联立战线——中主张反抗一切帝国主义到底的共产党加以尝试的压迫。”<sup>[2](211)</sup>

蔡和森指出,凯末尔对内对外政策出现了动摇,“一面显出浓厚的亲法倾向,一面对于共产党——土耳其民族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真正指导者——翻脸而加以压迫”。这种变化“表现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中之阶级抵抗”。蔡和森认为,严重的民族危机激起了土耳其民众反抗西欧帝国主义的感情,土耳其资产阶级利用这种民众情感以反抗协约国,凯末尔应时而起,成为反抗帝国主义的国民运动新领袖。“代表土耳其资产阶级的安戈拉政府,以为既借俄国帮助到了这步田地,全国劳动群众与苏俄的关系日深深切,则于土耳其资产阶级将来的存在终属危险,遂想渐采疏俄亲法之方针,因而深中法代表波益龙的鬼计,不久就有逮捕共产党之事发生。”<sup>[2](219-220)</sup>这一分析是十分深刻的。

蔡和森愤怒地谴责道:凯末尔这种举动,不但对于共产党为罪恶,对于国民运动也为罪恶。他指出,安戈拉政府若自拆墙脚而与西欧帝国主义妥协,共产党便可用自己的名义来号召不甘屈服的伟大群众,一面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一面推翻背叛国民公约的卖国政府。但蔡和森对凯末尔政权仍抱有希望。他说,洛桑会议“一面给基玛尔政府领略亲近法国帝国主义的新教训,一面给土耳其民族以重新估定前此致胜的对外对内之旧方针,亦未始非土耳其民族解放厄运中之转机。”<sup>[2](220)</sup>

#### 四、论说凯末尔革命的余音： 强调的与缺失的

凯末尔政权的这种变化,让致力于国共合作的中共措手不及,颇为被动。国民党右派分子一直对孙中山的联共政策抱有异议,对中共持怀疑甚至敌视态度。一些右派分子注意到了凯末尔政权的政策取向,他们不便公然反对联俄政策,但却以此为口实反对国共合作。1924年7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40

次会议上,张继就公然说:“国民党不可能与共产党人联合,这有例证:土耳其与共产党人有过联系,但现在有几十名共产党人被土耳其共和党枪杀了,由此可以得出:与共产党人合作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种宣传而已。”<sup>[1](499)</sup>对此,谭平山无言以对,只是反复强调中共坚持与国民党合作推动国民革命的决心,他说,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不考虑自己的后果。如果国民党突然不满意,比如把我抓起来,枪毙我,我也不后悔,因为我知道,我的同志们会按照我们的政策,继续完成工作”<sup>[1](499)</sup>。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继续讨论凯末尔革命就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境地。为推动国民党坚持联俄政策,有必要以凯末尔革命为例证,而宣传凯末尔革命,又会遇到凯末尔反共的问题,这又与国共合作的现实要求相悖。在这种情况下,自1923年开始中共对凯末尔革命的评说基本回避凯末尔反共、疏苏的问题,而将重心放在强调联俄的必要性,反复申说联俄在土耳其民族独立中的意义和作用。

1924年陈独秀就凯末尔政权实行政教分离政策,发表感想说,“以前尝有人说,东方有两个老大病夫,一是土耳其,一是中国。”土耳其毅然决然联络苏俄恢复国土并否认列强之治外法权,又毅然决然驱逐教主,“已经证明他不是老大病夫了,而我们中国还俯伏在列强军阀及礼教的势力之下,今后能否改变老大病夫的现状,改造后的中国国民党至少要负一半责任。”<sup>[6](427-428)</sup>

中俄条约的签订、孙中山对苏俄的亲近,让一些西方人士感到危险。法国《晨报》、美国《大陆报》称中国步步趋向赤俄的怀抱,鼓吹防止莫斯科援助亚洲民族自由运动发展到中国。针对这种论调,陈独秀指出,“苏联援助亚洲之土耳其与阿富汗的民族运动,这是事实;土耳其与阿富汗民族都因此得了相当的自由,这也是事实:亚洲民族自由运动发展,大不利于英、法、日、美各帝国主义的国家,这更是事实;可是英、法、日、美帝国主义者恐怕苏联援助之亚洲民族自由运动将发展到中国,于他们不利,便要联合压迫中国,这是何等横暴!”陈独秀宣称,“苏联的赤化运动时被压迫民族之福音”,“为了我们的民族自由,我们应该欢迎苏联,欢迎赤化呵!”<sup>[9](20)</sup>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留下国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要求国民党在民族运动中与苏俄相互提携,并希望苏俄政府继续援助中国革命。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巩固国民党与苏俄的合作关系,成为苏俄和中共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3月21日,蔡和森

发表《孙中山逝世与国民革命》,指出,土耳其革命一直到十月革命胜利,与苏俄联络之后,才有现在的成功。中国的革命也如现在的土耳其、波斯、印度、埃及等其他一切殖民地革命运动一样,是世界革命运动的一部分。要中国革命成功,必须与世界革命运动即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相联合。<sup>[2](727)</sup>言之所指,意在督促国民党坚持联俄政策。

11月7日,陈独秀在《十月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一文中指出,苏俄十月革命援助近东、运动诸弱小民族与被压迫的国家(如中国、土耳其、波斯、埃及、阿富汗等),建立了全世界被压迫者共同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之大本营,全世界被压迫阶级以及被压迫民族和国家,都应该联合起来在这世界革命的大本营援助之下,共同打倒国际帝国主义。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也应该顺着这个世界革命的大潮进行。针对有人担心苏俄是否会侵略中国,陈独秀指出,苏俄“对土耳其对波斯对阿富汗对中国,都放弃了旧俄所取得一切特权,使一切帝国主义者异常恐怖”。“所谓赤色帝国主义这一名词,乃帝国主义者捏造出来离间被压迫民族和苏俄的结合”。“联合被压迫民族共同打倒帝国主义乃苏俄立国之方针,‘对被压迫的民族只予不取’,乃列宁之遗训,他们对土耳其对波斯对阿富汗等,都不曾违背此遗训,岂有单要侵略中国之理。”至于联合苏俄是否会引起西方帝国主义之干涉,陈独秀指出,“中国自来不曾联俄,帝国主义者对付我们不算不严厉了,反之土耳其、波斯、阿富汗,正因其民族运动得着苏俄援助而发展,帝国主义者遂有所顾忌而让步”<sup>[9](118)</sup>。

显然,中共对凯末尔革命评说的着眼点是维护和巩固国民党与苏俄的合作关系,这一取向体现了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利益和要求,却回避了与中共自身休戚

相关的一个重大问题,即:民族解放运动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何在与资产阶级的合作中维护自身独立性,如何防止和应对国民党像凯末尔那样反戈一击。中共对凯末尔革命有选择性的评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俄、共产国际和中共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反映了在共产国际领导的框架下,苏俄的强势地位和中共独立性的缺失。

中国革命能否避免凯末尔结局,这是包括陈独秀、蔡和森在内的共产党人所必须回答而又难以回答的一个重大问题。历史的发展是,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在孙中山逝世后最终走向破裂,共产党人遭到血腥屠杀。大革命宣告失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征程依然漫长。

####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 [2] 蔡和森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3] 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 陈旭麓、郝盛潮.孙中山集外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 [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卷[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 [6]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M].北京:三联书店,1984.
- [7] 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8] 列宁论苏维埃国家对外政策[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
- [9] 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册[M].北京:三联书店,1984.

(责任编辑:张北根)

## Observation and Reaction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Turkish Revolution During 1921-1925

HUANG Zhi-gao

(Politics Department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China)

**Abstract** :Turkey had the similar situation with China. The success of Kemal with the support from the Soviet Russia mad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ncentrate on Kemal revolution. The strategic intention of uniting with Dr. Sun Yat-sen was reflected in the comment on Kemal revolution. The change of Kemal's political stand to anti-communist was covered up interntionally to some extent in the CPC's comment. The comment reflected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 and Soviet Russia.

**Key words** :kemal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soviet Russia